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 琳

台湾在近 400 年里两度经历殖民地时代,即 1642 至 1662 年和 1895 至 1945 年,先后被荷兰和日本占据。因此,殖民地历史是研究台湾史的重要一部分。特别是后一阶段的殖民地历史,因其年代较近,且长达半个世纪,与今天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密不可分。故而,为推动台湾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协办的“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于 2009 年 8 月 20—25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

一 研讨会内容

研讨会以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岛内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总督府殖民地统治政策等问题为主题,邀集海峡两岸和日本学者 70 余人,交换研究心得。会上共发表论文 59 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一) 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及总督府政策

针对近 20 年来台湾分裂主义者推广台独史观而建构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肯定论”的倾向,台湾佛光大学戚嘉林在《日据殖民在台近代化本质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据时期,日人在台以近代国家机器,通过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闻管制等手段,结合巨额现代资本入侵,构成殖民地剥削体系,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压榨台湾”政策,攫取巨额利润。而且,以歧视化的教育方针与不平等录取方式,剥夺台籍学生受教育机会。日人在台的殖民建设,从技术层面讲,应承认为台湾后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那是因战败离台而不得不留下的,并非善意援助。按比例原则,则不应蓄意抹煞日人在台近代建设的本质是残酷掠夺与压榨。

日本中京大学檜山幸夫的《日本帝国の台湾統治構造論とその支配原理》指出,日本在甲午战前是传统国家,甲午战后膨胀发展而成为大日本帝国。在此时的日本国家构造中,台湾被作为国家构成部分的固有领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在统治制度实态中,台湾总督并非土皇帝,他制订的法律,要经拓务大臣同意,并经内阁才能上呈天皇,可见实际权力在内阁。虽然紧急律令可由总督直接发布,但几十年中只有 10 次。日本欲同化台湾人,并推行对他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台湾总督府的权力与台湾政治构造方面,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与檜山幸夫观点不同,他在《台湾总督府文官制度研究》一文中认为,台湾总督府握有治台的立法、行政、教育、卫生、警察和司法等各项统治权力。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其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

^{*} 感谢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键指导概括几篇日文论文的要义并审阅全文。

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构造不是日本人对台湾人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文献馆陈文添利用日本近年开放的战前官方档案及台湾总督府档案等资料,探寻今天台湾属岛——兰屿归属问题的外交交涉和台湾总督府的调查及施政。他提出虽然清朝政府最先发现该岛,并曾派人实地勘察,却未有实际统治的事实,仍可能发生领土争议。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日与当时菲律宾殖民母国西班牙为明确疆界,发表台菲疆界宣言,将红头屿(后来的兰屿)列为台湾属岛,这才使该岛确实归入台湾界内。不过,依据现存大正、昭和时期资料,台湾总督府对兰屿的施政并不多,一些管制措施和建设规划似仅止于纸上作业。^①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赖正维的《日据台湾时期的“经略对岸”》一文指出,《马关条约》后,日本随即开始对一水相隔的福建实施“以台制华”政策。日本全面侵华后,台湾总督府又借助日籍台人和汪伪势力,在不同时期,或贩毒走私,或积极参与对福建的经济统制。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矶部靖的《日本统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社会・文化的统合の試みとその限界》一文,对日本占据下“台湾人意识”与“台湾人理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思潮,对当前岛内的“台湾人意识”与“台湾人理念”等有着直接的影响,今后有必要以日据前后台湾社会的连续与断层为线索,对此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东山京子以《台湾行启记录》有关资料,论述了天皇制国家日本和台湾人的国民统合。^②台湾大学法律学系阿部由理香根据驻日盟军总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的资料,指出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法律地位是“涩谷事件”后,通过GHQ中、日三者之间外交交涉而确立的。^③日本中京大学大友昌子的《日本统治下台湾の社会事业政策研究》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事业政策做了探讨。南开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赵铁锁与韩剑锋的《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政策》、明道大学应用日语学系黄颂显的《日据时期在台日人眼中的台湾总督府殖民统治》等文则分别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政策及其给在台日人之观感。

(二)台湾殖民地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在《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一文中,提出台湾的殖民地地位及殖民当局“将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的两岸隔离政策,使台湾的移民问题在日据时期出现新的时代特征:“即从历史上自西往东的单向度移民,朝着多维方向移民的态势发展,且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移民群体又各归原位,终点重回起点。”

台湾文献馆王学新撰文指出,1895年《马关条约》第五条第一项:“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其中“酌宜”二字在日文原文中为“日本國ノ都合ニヨリ”,即随日本方便之意。1900年前后警察制作的户口调查簿仅是调查现住者,到各家将调查簿上的人名与现住者相对比而已。^④而户籍簿仅有申报才处理,故常有不明异动情形。由于皆不完整,以致漏籍者不断出现。在日治时期对漏籍者的处理中,日本以“随日本国方便”的政略考虑为依据,否认一

① 陈文添:《日据时期的兰屿》,“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② 东山京子:《天皇制国家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国民统合》,“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③ 阿部由理香:《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法律地位 1945—1947——以GHQ对在日台湾人政策为中心》,“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④ 《警察の戸口調査に就て》,《台湾日日新報》1898年11月2日。见王学新:《日治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些犯罪者的国籍,并专案处理,准备“视时机送还清国”。或许总督府仅是出于岛内治安考虑,但若将“不良分子”秘密送往大陆,即使并非出自“浪人谋略”^①,也是出自“与邻为壑”之心态。

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郑政诚的《准军人的养成——日治时期台湾中等学校的军事训练》一文,指出以往有人认为日人为防台人武装反抗,直到二战末期才对台人子弟规定服兵役,中等学校学科中没有单独的军事课程。但是,从日治时期校刊、校友会志、毕业纪念册、口述访谈等材料中发现,日人早已在中等以上学校强化台人子弟的军事训练。1925年,日本政府为避免陆军大臣宇垣大量裁军而丧失职业的军人变成浮浪者,发布《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将资遣的现役军人分配到日本国内及殖民地中等以上学校服务,教授军事课程。中学生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政策下,被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尤其到1943年,在战争动员体制下,学生经常处在军事训练与勤劳奉仕状态中,学校多遭停课。这种训练有利于日本在战事急迫时缩短新兵训练时间,并使学生认可国家军人纪律与整齐形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台湾停止军事行动,但台湾总督府仍在运作,台湾社会尚未完全脱离日本殖民地机构的统治。从那时到中华民国开始接收台湾的10月25日,存在着一段“政治真空期”。过去的研究中,对于这段政权转换的真空期并未给予足够关注。会上,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阿部贤介在《二次大战前后的台湾人》一文中探讨了这段历史。文章讨论了因总督府的警察失去威信而产生的最迫切的治安问题与因发行大量的银行券^②而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以林献堂和吴新荣为例,展示了当时台湾人的表现。

(三)经济史研究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王键在《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对外贸易之初探》中,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配合日本需要,台湾对外贸易由日据前期的贸易自由化转为单一出口型殖民地贸易模式,且主要对宗主国日本输出,贸易品种则以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为主。台湾向日本长期提供蔗糖和稻米,充当日本的“米糖生产基地”。以米糖为中心的农业经济是当时台湾经济的主体,对日米糖出口是台湾殖民地对外贸易的主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周翔鹤认为只有对日资企业和传统经济部门都充分把握,才能准确分析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他在《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日本占据台湾时,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没有资本输出的需求;而台湾的传统经济已相当成熟,使日本在弱化殖民地传统经济部门之前能先加以利用,巩固其殖民地经营;台湾总督府以行政力量推动传统经济部门转型为近代企业,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宗主国日本的目的不在于台湾传统企业的转型,而在于本国的利益。虽然传统企业在组织形式与技术运用上的转变将导致其向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型,但我们无法期望在台湾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台湾交通大学黄绍恒在《日治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特征》一文中,也指出1930年代以后台湾的军需工业化是基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考虑,并非出自台湾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并不能使其向真正的工业化方向发展。这些论文都对台湾殖民地经济特征给予阐述,即被动型发展,缺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规划和导向,而主要以满足宗主国需要为目标。在这种发展态势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台湾殖民地经济的问题,如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形态的非正常转型、工业化的军需特征与局限。

① 日本有所谓“大陆浪人”,常适时在大陆制造混乱,配合日军的侵略。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问题、厦门事件、九一八事变等时期,都有浪人的踪迹。见王学新:《日治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② 该文称,日军判断盟军将在台湾登陆,为将台湾要塞化,需要大量临时军事费,因此台湾银行不得不发行巨额银行券。详见阿部贤介:《二次大战前后的台湾人》,“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25日,大连。

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台湾“中研院”台湾史所黄富三的《台湾总督府樟脑专卖政策与雾峰林家》一文,指出日治初期台湾总督府的樟脑政策与雾峰林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鉴于雾峰林家山区的重要地位,领台初期的总督府不得不谨慎对应,在不激起反抗的前提下将其纳入管辖。在1899年之前,总督府采取驱逐外商势力、怀柔林家的策略。1899年之后,总督府进一步实施专卖,控制樟脑产销,外商优势不复存在。随着林家在山区势力的消失和清代特权的丧失,其组织的小规模公司,难与日资、官资竞争,因此逐渐淡出樟脑业。同时,林朝栋在福建经营樟脑失败,樟脑市场全在总督府控制之下。关于鸦片渐禁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李理撰文《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原因再探析》,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水野提出以税收为基础的“鸦片渐禁政策”,虽未被日本采纳,但如果没有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的坚持,后藤新平的“渐禁政策”或许不可能那么快就被接受。日本帝国议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使“渐禁政策”突破最后防线而顺利通过。

此外,在区域贸易方面,有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萧明礼的《1930年代台湾对华南的水泥输出贸易》。在个案考察方面,有台湾成功大学经济学系洪绍洋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机械与造船业的发展——以台湾铁工所和台湾船渠为例》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林兰芳的《科技与社会——以台湾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为例(1919—1934)》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张怡敏的《战时体制下台湾银行业的经营问题——以株式会社彰化银行为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台史所李为楨的《战时体制下台湾金融统制与工业化资金问题——以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之资金筹措为考察》等论文。

(四)历史人物研究

对台湾殖民地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会议的一个热点。如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若林正文的《矢内原忠雄と植民地台湾人——植民地自治运动の言说同盟とその戦后》一文,就日本著名台湾问题研究权威矢内原忠雄对于日本学界早期台湾研究的指导性作用与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归纳出5大方面的内容。若林正文还指出矢内原忠雄与台湾自治运动倡导者蔡培火、林献堂是同盟关系,并以叶荣钟、陈茂源等台湾政治活动家为例,就矢内原忠雄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进行了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褚静涛的《陈仪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及研究》提出日据后期,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组织展开对台湾的考察和研究有独到处,但也有盲点。由于资料的局限性,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物”,而忽视了台湾的“人”,这在他后来治台中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却与同胞的迫切需要隔有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陈建樾撰文《“族”与“国”:李春生与清末民初的台湾》从“族”与“国”的观念入手,分析清末民初台湾知识分子国家观与民族观的流变过程。日本台湾学会理事长春山明哲在《后藤新平と台湾——植民地统治と文明の关系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一文中,以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统治理念形成过程为线索,对其台湾殖民地统治策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后藤新平的殖民地统治理念是欲将“整体的文明”引入台湾岛内,以期实现“健全而发达的殖民地经济”。该结论值得商榷。

关于台湾共产党的研究,近20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落土不凋的雨夜花》^①,卢修一著《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②,其中传记、口述类是重要的两种类型,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此次会议上,也有两篇研究日据时期台共人物的论文,

① 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台北:前卫出版社1990年版。

即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志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的《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蓝博洲继 2007 年发表《孤坟下的历史：张志忠及其妻儿》^①之后，再次撰文讲述张志忠的传奇历史及其妻儿季澧与杨扬的悲剧故事。《台共风云》一文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五）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

日据时期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台湾人，是目前台湾史学界一个正在研究的课题。现任台湾“中研院”台史所所长许雪姬，在《在中国东北的台湾人：1908—1945》一文中，指出当时“满洲”在日本控制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台湾人在台求学、求职机会少，因此“满洲”成为台湾人发展的新天地。保守估计，到过“满洲”的台湾人前后至少有 5000 人。他们均具中上素质，从事正当职业，在日本战败回台后，亦能发挥在“满洲”的经验所长，投入战后台湾建设。

福建和台湾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渊源深厚，闽台关系素来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会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谢必震的《略论日据时期的闽台关系》一文，对日据时期台湾和福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在社会学中，比较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此次会议上亦有几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如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高淑媛的《日本统治末期台湾工业技术人才养成——台南与东北的交会》台湾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翁嘉禧与王林楠的《日据时期台湾与东北地区煤矿业之发展——以基隆与抚顺煤矿为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倩的《对日本统治台湾、大连时期电影业若干问题的考察》台湾“中研院”台史所钟淑敏的《试论后藤新平与伊泽多喜男——从专卖局与鸦片事件谈起》等。可见，比较研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台湾史研究，而将台湾或台湾某地区与大陆或大陆某地区的同一方面进行比较，是其中的热点。

（六）其他

会议提交论文，还有研究综述及资料介绍类的。如，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的《日据时期对荷据台湾史的研究》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许毓良的《日据时期的清代台湾史研究回顾——以台北帝大文政学部研究年报与光复初期台湾岛内发行的杂志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李然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书及其台湾史料建设概述》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张围东的《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馆藏台湾数据探析》等文。宗教研究类，如台湾“国史馆”卓遵宏与徐一智的《从〈台湾神社与宗教〉管窥日据时代台湾佛教》日本宇都宫大学国际学部松金公正的《殖民地时期真宗大谷派在台湾布教的演变——台北别院落成的象征意义》等文。教育类，如日本中京大学国际教养学部酒井惠美子的《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公学校教科书编纂をめぐって》。原住民研究，如台湾政治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藤井志津枝（傅琪贻）的《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出发前夕的台湾——1940年日军南进的系谱》。妇女史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刘佳的《角色扮演与榜样塑造——台湾列女群体的地域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的《试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妇女的“皇民化”塑造》等文。民众的反抗与斗争研究，如大连民族学院关捷的《日本对台湾、大连的统治与人民反抗斗争之比较》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孟祥瀚的《一九二八年台中市赵明河事件初探》台盟中央研究室潘新洋的《简述台湾革命同盟会》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刘相平的《反战斗争中的台籍日本兵》等文。

^① 收入钱永祥编《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台北：联经出版社 2007 年版。

二 研究现状及问题^①

就地域而言,研讨会收到论文 59篇,其中大陆 22篇,台湾 24篇,日本 13篇。台湾有资料方面的优势与便利,确实呈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大陆方面的台湾史研究起步晚,资料少。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大多资料是日文,需要日文功底。对大陆学者来说,面临困难多,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大陆方面的 22篇中,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据有马首地位。

就研究类别而言,社会史方面论文数最多,其次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教育史再次,日台关系与两岸关系史末之。这显示出与当前学术界潮流大体一致的态势,社会史、经济史是主流课题。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史仍占重要地位,对于殖民地历史、转型期历史来说,政治史尤为重要,不能忽视和偏废。文化史研究本可更为丰富多彩,如可以研究服饰、语言等,而此次会议在这方面研究的多样性不足。

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也有欠缺之处。主题上,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人士研究较少,日本对台政策研究和国民政府对台政策研究也较欠缺。研究方法大体体现了当代史学界的主流,即偏重于以个案为中心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个案研究也有缺点,它不能解决史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还需整体研究对其进行综合和提高。比较研究方面,仅侧重于大陆某地区与台湾某地区的比较,关于日本在台殖民政策与日本在朝鲜或南太平洋或沦陷区的殖民政策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会议论文普遍利用档案作为论述依据,是值得肯定的。同时,我们不应满足于档案资料。如何拓宽资料来源,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台湾殖民地史研究也不例外。如台湾总督府档案,完全以其为论述依据,则易被导向某个与历史真实有所偏离的方向。又如口述史,因为距离访谈时间的久远、当时时代背景的局限、记录者的主观、提问的诱导等因素,均会造成资料的偏差。今后在台湾殖民地史研究中,放开眼界,建立宽广历史观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与会学者认为两岸应继续加强学术交流,才能共同促进台湾殖民地史的研究。目前的交流有限,这使双方不能充分了解和共享对方的研究成果和资源,造成一些低水平重复和脑力浪费。如一些题目在台湾已研究得很成熟,而大陆还作为新课题在发展。只有更多交流,才能使每项研究都“站在前人的肩上”,共同提高研究水准。同时,大陆学者倘若能有机会用较长时间在台湾查找资料,亲身感受台湾的人文政治和自然环境等,亦将对台湾史的研究大有帮助。

(作者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朝光的学术总结。